

APEC 会议 13 年后重返中国有何意味？

今年是 APEC 成立 25 周年,也是中国时隔 13 年再次举办 APEC 会议。过去 13 年,不仅是中国快速提升经济实力的 13 年,更是中国逐步参与国际经济事务、并日益扮演主要角色的 13 年。2001 年上海 APEC 会议时,中国的 GDP 还不到日本的一半,但 13 年后,中国已超越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APEC 会议重返中国,无疑让这次北京“年会”具有了 13 年前不可比拟的含金量。中国国际地位的今非昔比,也让世界高度关注;作为东道主的中国,将会在本届会议中为推动亚太经济合作发挥怎样的作用?

【变化】

从上海 APEC 会议到北京 APEC 会议
“主场外交”展现中国全球影响力

5 日是本届 APEC 会议最后一次高官会,也拉开了 2014 年 APEC 领导人会议周的大幕,继亚信峰会后,中国将再次迎来一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主场外交”。正如王毅外长在“蓝厅论坛”演讲中宣告——中国已经做好了北京 APEC 会议的准备。

“13 年前的中国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举办此次 APEC 会议本身就是展示中国的实力,不仅是经济实力,也包括中国的国际地位影响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作用都会在这次 APEC 会议中显示出来。”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对新京报记者表示。

2001 年 10 月,上海成功举办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那时的上海还不具备世界金融中心的气质,中国也还不是 WTO 成员,亚太还尚未从 1997 年那场金融危机中完全复苏,世界

也正笼罩在 9·11 事件带来的恐怖阴云中。

但上海 APEC 会议通过的《领导人宣言》在危机时刻增强了各成员应对经济困难、恢复全球经济增长的信心。作为《领导人宣言》附件的《上海共识》为 APEC 未来发展确定了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议程,正是这些成果,在后来的十余年极大鼓舞和促进了今后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

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那次 APEC 会议上表示,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中国举行,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机遇,APEC《上海共识》对推动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将起重要作用。

“作为 APEC 成员,中国从学习到逐步发挥推动作用,转折点就是 2001 年承办 APEC 会议,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如此大型国际会议,很成功,这使中国更有信心参与 APEC。”曾推动中国加入 APEC 的全国政协委员张蕴岭对新京报记者表示。

【贡献】

从“新人”到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六成对外贸易在亚太地区

13 年后,北京成为中国第二次承办 APEC 会议的城市,而此时,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 由 2001 年的 1.3 万亿美元攀升到 2013 年的 9 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亚太地区也日益倚重中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中国对亚洲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超过 50%,中国经济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就将拉动亚洲经济增长 0.3 个百分点。

亚太在倚重中国,中国在过去 13 年中也越来越融入亚太。2013 年,中国与 APEC 成员贸

易额已占对外贸易总额 60%,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 83%和对外投资的 69%都是与 APEC 成员之间进行。

自身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中国在 APEC 中的话语权也在不断增强,话语权的增强也使中国为亚太地区发展做出长足性贡献。

资深外交官吴建民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其中之一就是发起成立“10+1 (东盟 10 国 + 中国)自贸区”,使其与 APEC 共同组成亚太区域合作网络。这是 2000 年朱镕基总理在新加坡举行的 10+1 会议上提出的。经过一系列谈判准备,2010 年,“10+1 自贸区”生效,这一自贸区带来巨大变化:2009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额为 1782 亿美元,但仅仅 4 年后的 2013 年,这一数字就达到 4436 亿美元。

对于中国在 APEC 中发挥的作用,张蕴岭表示,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中国经济成为支撑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中国经济发展不断进行改革与开放,这和 APEC 发展方向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中国不断提出倡议,例如,金融危机后,中国提出进行金融合作,特别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是 APEC 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倡议。

与 13 年前上海 APEC 会议相比,今年北京 APEC 会议在议题方面有了许多创新,显得更加具有建设性。今年全年,APEC 经济体共提出超过 100 项合作倡议,其中 50 多项是中方提出,中方还首次倡导在 APEC 平台上开展全球价值链、互联网经济、城镇化这些新领域合作。

另外,上海 APEC 会议上表达了对 APEC 本身贸易自由化的关切,而 13 年后的北京 APEC 会议则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现实的想法。据悉,此次会议有望在三方面取得新突破:首先是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其次是明确经济改革、创新增长等五大支柱领域;再次是推

动并制定《APEC 互联互通蓝图》。

【挑战】

亚太经济合作发展有点“散”
中国推动三大突破团结 APEC

中国希望在本次会议上推动上述三方面突破,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为应对 APEC 在当下复杂的亚太政治经济形势下所面临的挑战。

目前,亚太地区在经济合作过程中,各种机制层出不穷,其中最为典型的即为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这一机制虽对区域合作也有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出现竞争,甚至排他性张力。正因如此,中国在此次 APEC 会议上提出启动亚太自贸区进程,将 APEC 成员聚合在一起,对推进亚太自贸区进程形成合力,不再任由碎片化趋势发展。

APEC 前高官王嵎生对新京报记者说:“这次中国作为东道主,提出启动亚太区自贸进程等三大突破是顺应时代要求的。2001 年,中国承办 APEC 会议时,发展中成员还未大面积兴起,但过去 13 年来,发展中成员快速崛起,因此对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诉求更加强烈。”

APEC 虽面临挑战,但这也为中国成为亚太地区负责任大国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在张蕴岭看来,中国举办此次 APEC 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给大家提气。他说,新一代中国领导人有很多新倡议,不仅是对 APEC,中国本身也在深化改革,这会使来参会的 APEC 经济体对中国很有信心,而只要中国能做成事,也必将有利于本地区发展。“北京 APEC 会议是最重要时机,中国把这个艰难的项目提出来,并推动实质进展,是希望为亚太一体化做实实在在的事情。”(摘自新华网)

揭开干部档案造假背后的猫腻

8 年时间,8 个岗位,横跨两省 5 地,且多个岗位任职不满一年,一名副科级乡镇干部就变身为正处级团市委书记,还戴上了省政协委员的光环。

因涉嫌违纪,江西省政协日前作出决定,撤销原鹰潭团市委书记徐楷江西省政协委员资格。经调查核实,徐楷涉嫌年龄造假、入团志愿书造假、违规任用等问题。

“仕途”开始就违规 通过入团志愿书将虚假年龄“合法化”

2013 年 9 月,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指出,徐楷涉嫌“造假骗官”。江西省成立专项工作小组调查发现,徐楷涉嫌年龄造假、入团志愿书造假、违规任用等问题基本属实。

据组织部门的一份材料显示,2005 年 6 月,徐楷从南昌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随后被江西省委组织部录用为选调生,安排到江西景德镇市浮梁县洪源镇担任副镇长、党委委员,取得公务员身份。

徐楷的“仕途”从一开始就存在明显的晋升年限违规问题。根据 2000 年《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关于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的通知》,“选调生在基层工作锻炼满两年后,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根据个人条件和工作需要,择优选拔任用”,然而,徐楷仅 1 年 3 个月后就从副科级提升为主任科员。

2008 年底徐楷任景德镇人事局职称科科长。2009 年 1 月,又通过公推竞选担任安徽省合肥市团市委副书记。江西省一名熟知组工工作的人士说,通过档案造假,徐楷获得 2008 年安徽合肥面向全国公选团市委书记的参选资格。

根据合肥市当时的公示,公推竞选对象须为 1980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徐楷的年龄存在 1978 年和 1980 年两个版本。

徐楷在南昌大学就读硕士期间刊发的一篇文章显示,徐楷出生于 1978 年 11 月。然而,此后他发表的数篇论文又显示为 1980 年出生。

“提供一份虚假入团志愿书,再通过组织认定,就等于把虚假的年龄‘合法化’了。”这名熟知组工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入团志愿书造假和年龄造假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关联。干部年龄的认定,一般以档案中最早的一份材料记载为基准点。而入团志愿书是档案中比较早的材料,是认定干部年龄、工龄、党龄的重要依据。

不到两年后,徐楷又从安徽调回江西鹰潭市任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同时挂职担任贵溪市委副书记。2012 年 11 月,调任共青团鹰潭市委党组书记,当年 12 月当选为鹰潭团市委书记。“如此跨省、多岗位频繁调动,仅从理论上可以做到,普通干部在实际中难以实现。”知情人士说。

江西省专项工作小组的调查发现,徐楷还存在被违规录用为公务员、伪造档案、对抗组织调查等严重违纪问题,调查组将进一步核实,并根据调查核实情况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

造假三大猫腻:提拔前后是高峰,调动工作
是良机,组织认定合法化

徐楷档案造假事件并非个案。据中央巡视组通报,去年以来,已公开通报的 31 个被巡视省区市中,有 11 个存在干部档案造假问题。针对这一现象,一些地方开始探索防治干部档案造假的“药方”。今年 9 月起,江西南昌在全市开展为期 4 个月的假履历、假档案专项整治行动,目前正处于全面排查阶段。

南昌等地一些组工干部分析认为,档案造假现象主要存在三大猫腻:

——一是造假目的就是为“升官”,时间多集中在干部提拔任用前后。

档案中最为关键的年龄、基层工作经历等

造假,主要集中在干部选拔任用前后。早在 2005 年,南昌市委组织部就曾一次性审核发现干部档案工龄、年龄、党龄“三龄”前后记载不一致问题 437 例,其中涉及到在职县处级干部 319 名。

“造假的主要目的在于‘升官’,正如坊间戏言,‘干部职务越高,年龄越小’。”南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晓波从事组织工作已 20 年,他告诉记者,南昌市委组织部曾发现,一名拟提拔的科级干部年龄造假存在明显的逻辑错误。“按档案上的年龄推断,他两岁就已经读小学一年级了。”杨晓波说。

——二是造假环节集中,常借工作调动之机“瞒天过海”。

一些基层组工干部告诉记者,由于档案管理制度严格,平时难以寻觅造假“良机”,所以,干部档案造假最常用的伎俩就是抓住工作调动之机,利用调出单位与调入单位之间的衔接漏洞,实施造假。

“反正你要调走了,也不影响本单位利益,而调入单位审核时也只是‘走走过场’。”一名基层组工干部告诉记者,一般造假者都会在原单位“做齐”所需档案资料,再趁工作调任时,实现公务员身份转变或职务提升。

——三是造假暗藏“玄机”,“权力干预”背后实为领导授意。

根据档案管理相关规定,档案在档案室由专人管理,借阅、使用须遵循严格的档案管理制度。据透露,干部档案造假的首要前提是能接触到档案,有的是造假者通过收买档案管理者造假,但更多的则是组织人事部门按照上级领导授意而为之。

“档案必须符合前后逻辑。因此,并不是简单的某一环节的造假,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只要是其工作过的单位和环节,都必须全部打通。”杨晓波告诉记者,在这一过程中,造假者需要在档案中加塞或撤销某些材料,最严重的则是伪造相关证明材料,把虚假的年龄、工作经历等通

过组织认定合法化。

通过信息化管理减少人为干预,加强“异常提拔”监管力度

专家指出,突破诚信底线进行档案造假,谋取的尽管是一己私利,损害的却是干部选拔任用的公平、公正,危害不容小觑。

“通过利益输送或权力干预进行干部档案造假,事实上也是变相的腐败。”江西省社联副主席吴永明认为,干部档案造假意味着对组织失信,必须标本兼治,才能公平正义、取信于民。

吴永明建议,在信息化时代,干部档案管理制度建设要跟上信息化步伐,探索实施数据化管理,减少档案管理过程中人为接触原始纸质档案的环节和可能。进一步公开信息,把干部档案、履历“晒”在阳光下,接受公众监督,让造假者的猫腻无处可藏。与此同时,加大惩处力度,让档案造假者付出沉重代价。

“干部档案管理还应建立完善的追责机制,如出现档案涂改造假,首先要追究档案管理者以及授意或参与篡改、造假的相关人员的责任。”杨晓波告诉记者,我国干部管理制度已经运行多年,制度建设非常严密,之所以出现档案造假情况,问题主要在档案管理过程中,相关人员并未严格按照规章制度管理、使用档案。

“对于热衷‘造假骗官’者来说,岗位并非为人民服务的平台,而是进一步升迁的‘跳板’,其提拔速度越快,越是党和人民之祸。”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肖滨认为,要从源头上遏制干部档案造假现象,还需进一步改进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高决策透明度,严格执行公示制度,对“异常提拔”的干部要重点监控,避免关起门来选人、用人,为暗箱操作提供可乘之机。

(摘自新华网)

责任编辑 张维峰